

霸权转移中的大国心态调整 ——以二战后英美在中东的权力交接为例

刘明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 湖北武汉, 430074)

摘要: 经济实力决定着霸权演变的发展趋势,但在特定背景下,官方心态对霸权转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战之后,通过遏制前苏联确保自身的大国地位是英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英国为此在中东维持排他性的霸主地位,信心满满是英国大国心态的典型特征。在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下,在美国的战略挤压下,英国通过向外界展示其主导地位证明自己在中东的霸权,信心不足的焦虑性成为英国大国心态的新特征。在英国与民族主义者决裂时,英国试图绕过美国,用孤注一掷的方式宣示英国的霸权,非生既死的冒险性成为英国大国心态的新表现。在冒险失败后,英国承认了美国的冷战大局,中东霸主的权力交接基本完成。英国在中东的大国心态调整表明,霸权转移也是一种心态调整的主观过程。

关键词: 英国; 大国心态; 霸权转移; 中东; 美国; 苏伊士运河危机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5)06-0123-06

二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来形容战后的国际局势: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虽然丘吉尔的本意并不是谈英国的衰落,但许多学者从丘吉尔的话中受益,研究英国的衰落一时成为非常时髦的学问。^①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的衰落是与美国的崛起直接相联的,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世界霸权,日不落帝国让位于美帝国主义。^②在这一逻辑下,英国的衰落与美国的崛起衔接得天衣无缝,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国际霸权交接的契机^[1],整个世界开始变成美国的“盘中餐”^[2]。然而,这种看似合理的结论并不能帮助人们准确地理解战后的历史: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英美的战略竞争从未停止,这种竞争最终演变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两者的分歧公示于众。实际上,抛却事后诸葛的假聪明,我们发现衰落的概念并不完全是一个质的界定,它在许多时候也是量的变化。而在涉及到量化的时候,错误认知就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3]丘吉尔后面的一句话被许多人忽视了:只有英国小毛驴才知道回家的路。换句话说,英国作为一个大国还承担有无可推卸的领导世界的责任。这种争当领导者的大国心态是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遗憾的是,大部分

学者对这一点缺乏足够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对英美中东档案文件进行解读,从大国心态调整角度分析国际体系在中东的演变历程,以加深对霸权转移复杂性的理解。

一、英国固守中东的大国心态

英国经济在战后面临严峻的挑战。英镑收支差额是英国黄金加美元总储备的七倍^[4],随着美国停止租借法案,英国立刻处于危机之中,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警告说英国在财政上面临敦刻尔克大危机,应该放弃许多不必要的负担,“当我们变成另外半个世界的爪牙时,我们不能以自己的财力管理半个世界。”^[5]严峻的财政匮乏使财政大臣多尔顿要求削减政府开支,为此不惜以辞职要挟内阁。然而,财政困难并没有影响英国政府的大国心态。二战尘烟未落,艾德礼就在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说英美合作应该坚持下去,因为“世界和平最终取决于英美广泛合作”^{[6][19]}。在这一点上,外交大臣贝文与军方坚决地站在艾德礼一边。保守党与工党存在严重的政治歧见,但对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却与工党如出一辙,保守党领袖丘吉尔提出的“三

收稿日期: 2015-03-03; 修回日期: 2015-05-24

基金项目: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英帝国的形成、发展及其在20世纪的崩溃”(11ASS001);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763—1815年的英国结盟外交”(2014047)

作者简介: 刘明周(1980—),男,河南安阳人,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英帝国史,国际关系

环外交”就是这种大国心态的集中体现。也就是说,英国战后的大国实践是在两党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推行的,具有更大的延续性。

“三环外交”也为英国维持大国地位提供了一种现实途径,英国可以通过在英帝国与英联邦、英语民族、欧洲三个环节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加以实现,英国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对英国政府来说,遏制前苏联就是英国承担国际义务的集中体现,也是证明其作为世界大国的标志。^[7]英国固守中东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因为中东正是遏制前苏联的桥头堡。在1945年3月内阁会议上,代首相艾德礼指出,既然苏伊士运河是一条国际水道并让全世界人民得益,为什么要让英国独自承担防卫代的价呢?为什么不让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也来承担这一代价?他建议重新考虑英国中东防务问题。^{[8](1-4)}当时的外交大臣艾登反对艾德礼的提议,认为埃及与苏伊士运河是英国中东防务的核心,对“英帝国而言生死攸关”。^{[8](7)}在工党政府成立后,中东由于在对抗前苏联的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而获得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对军方而言,如果能够保留英国在中东的战略据点,英国就可以威慑苏联,在英苏爆发战争时,以中东为基地直接攻击苏联乌克兰工业带与高加索石油。^[9]对外交大臣贝文来说,“维持我们的中东地位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中心特色。因此我们必须准备承担义务和费用来维持我们的地位。”^[10]在外交部与军方的大力支持下,英国政府确立了固守中东的战略,苏伊士运河区则是英国在中东的核心防区。

英国固守中东的战略也获得其盟友美国的支持。在战后初期,美国当时的主流意见认为美国在非洲与中东利益并不明显。已经获得巨大名声的汉斯·摩根索认为美国在此“没有特殊的政治与军事利益”^[11]。美国的经济认知同样如此,美国政府认为其主要经济利益在国内是向大众消费主义转变,在国外则是重建欧洲。非洲与中东知识与专家匮乏也制约美国在此制定合理的政策。与美国大部分外交政策都会遭到学界与媒体激烈批评相对应的是,美国这一时期的非洲与中东政策基本没有讨论的声音,实际上,美国甚至没有专门的中东事务局的设置,其相关知识也主要来自欧洲。另一方面,美国冷战考虑支配了美国的非洲与中东政策。随着美苏联冷战的开始,冷战成为指导美国外交的最高原则。由于欧洲处于冷战第一线,美国政府总是把其欧洲盟友的行为高尚化,殖民地问题也受此影响。菲利普·贝尔强烈反对美国基于“普遍道义政治的态度”支持殖民地独立,认为欧洲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是“幸福的殖民关系”。^[12]同时,美国冷战的一个重要考虑是恢复西欧经济,其时普遍认为西

欧经济恢复离不开殖民地的资源与市场,基于此,美国态度是尽可能延迟殖民地的独立进程。最明显表现是美国在联合国关于非殖民化表决中总是投弃权票。负责该领域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乔治·麦吉就集中体现了美国的心态,“美国政府一直认为那些原始、未开化民族不成熟的独立只能给当事人带来更大害处而不是益处”。^[13]麦吉主张通过支持英国从而维护西方的整体利益,在其努力下,美国支持英国在中东地区承担主要的防务责任。

在这一阶段,信心满满是英国大国心态的典型特征,来自各方面的支持都被理想化了。实际上,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的三个基础都不够牢靠。首先,英国认为自己可以操纵殖民地,让殖民地配合英国的防务安排,英国并非没有意识到民族主义者的反抗。然而强调宗主国权力的心态是极为明显的,这从英国驻埃大使基里亚恩勋爵身上可以体现出来。当埃及的华夫脱党政府希望英国从埃及撤军并承认埃及对苏丹的主权时,基里亚恩认为这些精英并不是埃及人民的代表,不应该与之谈判。其次,英国高估了美国对英国防务的支持。贝文敏锐地发现英国固守中东的战略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其努力下,英国与美国在中东问题上达成谅解,英国几乎在中东维持着排他性的地位。英美特殊关系的论调一时大行其道,英国政治家也一厢情愿地把其摆在理想的神龛中,低估了英美的战略分歧。最后,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国力仍然可以支撑大国防务战略。虽然凯恩斯警告英国的经济可能影响英国的大国地位,内阁中与经济事务相关的官员对大国防务心存疑虑,但大部分官员对此并不认同,在战后有极大话语权的军方也总是把战略利益放在经济考虑之上。然而,基于经济方面的担忧并非全无道理,残酷的现实总是会说明真相。

二、焦虑的大国心态

信心满满的大国心态很快遭到现实的挑战,埃及民众以超乎英国预期的方式挑战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安排。由于英国不肯积极回应民族主义者的要求,埃及民众掀起抗英浪潮。1946年2月,开罗学生举行集会,在示威中提出“英国军队滚出埃及”的口号。在冲突中,埃及学生伤亡超过50人。^{[14](127)}英国镇压学生的行动又激化了埃及人的反英斗争,反英运动向全国蔓延。^[15]虽然英国在形势的压力下不得不与埃及谈判,但宗主国心态并没有放弃,这就使得英国开出的条件非常有限:英军从埃及撤出期限为5年,而且在发生

与英国有关的战争时，英国可以重新启用苏伊士运河基地。埃及首相西德吉在民众压力下又提出归还苏丹的要求，由于英埃谈判无果而终，更加激进的埃及政府则决定单方面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和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的协定，英国在埃及的地位有被彻底颠覆的危险。新上台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同样秉持大国心态，丘吉尔首相决定对埃及的“挑衅行为”采取强硬政策。在丘吉尔眼中，埃及人是“低劣的野蛮人”^[16]，仅仅是恫吓方式就可以使埃及人接受英国的条件^[17]。外交大臣艾登则逐渐认识到埃及民族主义的力量，认为英国必须与埃及谈判。^{[18](125-126)}艾登的想法得到军方支持，丘吉尔最后默认了艾登的谈判政策，结果是英国与埃及政府签订1954年协议，埃及民族主义者对苏伊士的主权要求得到满足。

但是艾登在继续维持英国大国地位上与丘吉尔并无不同，他在意的主要是内容而不是形式。对艾登来说，1954年条约远不是英国从中东撤退的标志，与纳赛尔友好解决苏伊士问题是为了获得民族主义者好感，在减少其反对的条件下实现英国的中东战略。在达成1954年条约后，艾登很快把注意力放到构建中东防务体系上，在其撮合下，伊拉克、土耳其在巴格达签订防务条约，英国通过该条约继续推行中东的防务战略。艾登在中东追求实质霸主的政策与埃及政府再次产生尖锐矛盾。条约签订不久，更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以八颗子弹向纳赛尔报复。在感觉到埃及民众的不满情绪后，纳赛尔决定把反殖民主义进行到底。对英国政府推行的巴格达防务条约，以开罗为中心的阿拉伯之声不停地向阿拉伯世界宣传同样的内容：任何西方的防务体系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在纳赛尔反对下，英国中东防务体系没有成功，叙利亚、黎巴嫩，甚至英国传统盟友约旦都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叙利亚甚至加入埃及的防务体系。^{[14](140)}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面临严峻的挑战。

另一方面，英国在中东的主要盟友美国也逐渐放弃了对英国的支持。长期以来，乔治·麦吉的思想在美国中东战略中占据统治地位，美国也一直采取支持英国的态度。麦吉把抽象的西方利益摆在首位，认为英国利益与美国利益是一致的。实际上远没有这么简单。当美国利益与英国利益产生冲突时，美国还能够支持英国吗？随着时间推移，美国战略专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汉斯·摩根索认为美国让“当地民众自治的长期政治发展利益屈服于短期战略与权宜考虑”并不合适，他建议增加联合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的权力。^{[11](317-318)}保罗·尼采也建议美国在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19]，鲍尔斯则建议为非

殖民化提出具体的时间表^[20]。随着英国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美国越来越不相信英国在中东的防务体系。1949年，美国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陆军的声音占据上风，他们认为中东航道非常危险，要求美国集中资源建设西班牙南部，把更多的资源向欧洲倾斜。^{[8](lxii)}

英美的战略歧见很快就明朗了。由于艾登的计划失败，掌握了主动权的丘吉尔决定对埃及采取强硬政策，但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丘吉尔清楚地知道英国必须获得美国的支持，他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无疑我们寻求或者需要你们军事、物质和金融支持……我们应该向独裁者显示我们有一致计划。”^{[21](1990)}但美国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在回信中说，如果美国 and 英国站在一起反对埃及政府，给人的印象是英美联合起来给埃及最后通牒。^{[21](2028)}美国的反应体现了其新的中东思维。1953年后，美苏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已经延伸到中东地区，中东殖民地在美国的战略中已经不再是欧洲附庸而变成一个独立领域。1953年5月国务卿杜勒斯访问中东与北非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他最大的印象是中东的反英倾向已经达到惊人地步，他认为英国在中东已经不再适于扮演领导者角色，为对抗苏联集团，美国必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发展自己独立的防务政策。根据杜勒斯的提议，美国决定在中东建立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为核心的防务体系，在这一防务体系中，英国高度重视的埃及被搁置在一边。^[22]

如果说英国在第一阶段认为自己在中东的霸主地位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不必要刻意地向外界作任何证明，英国的大国心态此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埃及破坏英国的防务安排时，英国努力向外界证明自己仍然是埃及的主导者。外交部常务次官萨金特认为埃及政府感觉英国已经衰落所以总是提出一些过分要求，英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来显示英国力量并警告埃及不可轻视英帝国。^{[8](225-226)}贝文也把维护英国威望作为重要任务进行考虑，例如他坚持英国战时使用苏伊士运河区并反对归还苏丹的部分原因是通过这些事情让埃及明白英国才是一锤定音者，“千万不能让埃及政府觉得英国政府在根据埃及的方式行事。”^{[8](268-269)}当英美的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准备推出自己的中东防务战略时，英国也努力向外界证明英国的防务安排是不可替代的。虽然美国敦促英国放弃旧防务体系并逐步向美国防务政策靠拢，英国却不遗余力地继续推动巴格达条约。实际上，失去了美国的支持，英国是没有办法在中东对抗苏联的。或者说，通过防务战略向外界展示英国仍然是中东霸主的仪式成为首要目

的。在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中,在美国的战略挤压下,英国在中东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于是,英国政府试图通过某些形式向外界证明自己仍然是中东的霸主。而当英国努力向外界证明自己可以操纵局面并不可替代的时候,没有把握的大国焦虑心态就成为英国在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

三、英国放弃霸主心态

1956年1月,英国政府得出结论说,纳赛尔领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正在彻底清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23]3月,约旦国王侯赛因解除英国格拉布爵士对阿拉伯军团的领导权,艾登认为这是纳赛尔的阴谋,其私人秘书透露了艾登准备动武的想法,“他把我拉到一边说正在严肃地考虑重占苏伊士运河来反击解除格拉布爵士对我们威望的冲击。”^{[18](xxxiii)}在纳赛尔宣布对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决定后,英国与民族主义者彻底决裂,英国面临着严峻的抉择。

对美国来说,冷战仍然是其考虑的首要因素。西方武力政策必然会使阿拉伯国家彻底倒向苏联阵营,同时削弱中东那些亲西方的保守派地位,最终破坏冷战大局。在与英国官员的交流中,杜勒斯明确地表明美国反对武力政策,“我们旗帜鲜明的态度是,无论哪一方开启战端,我们都将阻止冲突。”^[24]艾森豪威尔也在给艾登的信中表明美国对武力政策的态度,“就个人而言,我认为美国人的反应一定非常严厉,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也将采取同样的反应。”^{[25](70)}

但对艾登政府来说,英国或者采取无所作为的方式承认民族主义者占据主导地位,彻底结束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或者通过击败民族主义者向外界证明英国仍然是中东的霸主。不甘心拱手让出霸主地位的英国决定孤注一掷。正如内阁所言,这是关乎英国作为大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英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英国将独自行动,因为对纳赛尔的“挑衅”无动于衷将让英国的中东盟友失望,英国在中东的威望将荡然无存。^{[18](165-169)}然而,孤注一掷实际上是一种赌博,非生既死的冒险性成为英国大国心态的新表现。

英国虽然在表面上不得不敷衍美国拒绝动武的要求,但在背地里与法国、以色列密谋侵略埃及。7月29日,以色列入侵埃及,英法以调停为名轰炸埃及空军基地,英国也很快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区,计划似乎马上就要成功。但问题很快出现了,入侵埃及的直接

结果是英国石油供应出现问题,英镑地位也岌岌可危。正如上文所言,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需要英国实力的支撑,但英国官员的战略思维往往凌驾于实力基础之上。现在事实证明英国的实力也无法支撑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财政大臣麦克米伦认为如果继续进行战争,美国援助必不可少。^[26]

美国却采取了艾登完全意想不到的态度,艾森豪威尔迅速给艾登打电话,“安东尼,你是不是疯了?你欺骗我。”^[27]美国政府严厉敦促英、法、以无条件撤军。苏伊士运河事件非常明朗地表明美国的冷战战略与英国的帝国游戏是矛盾的,西方利益并不是铁板一块。英国一直不愿意屈从于美国的冷战大局,希望以英帝国与英联邦为基础把英国确立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势力。现在,在英美利益明显不同时,美国必须做出抉择。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言,“如果我们支持英法,代价是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怎么可能支持他们?”^{[25](910)}杜勒斯的考虑也同样把冷战放在了第一位。^[28]基于战略考虑,美国拒绝为英国提供石油,也不肯解救英镑危机。

英法入侵也招致苏联反对,赫鲁晓夫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付侵略者。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则以联合国为舞台攻击英法过时的殖民政策。在英国国内,艾登的支持者也开始改变立场。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艾登坦言自己的困境,“我不能坚持了。我正在被所有人抛弃。我的忠实的同事纳丁已辞去国务大臣的职务,我不再能依靠保守党内的举党一致。坎伯雷大主教、教会牧师、石油商,每一个人都反对我!”^[29]英国政府最后无条件地退出了苏伊士运河区。英国本来想向外界传递英国仍然是中东霸主的符号,但结果却完全相反。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结果表明,英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建立在美国的支持上,在失去美国支持后,英国(甚至盟国配合)难以处理任何重大国际问题。英国政府的大国心态再次调整,开始放弃了以与美苏平等为核心的第三极势力的追求,承认了美国战略优先的地位。这从艾登辞职与麦克米伦接任首相可以看得出来,艾登的传记作者披露麦克米伦继任英国首相是英国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协商的结果,美国认为麦克米伦才是美英合作的最佳人选。^{[30](179)}新上任的麦克米伦首相承认了美国冷战大局优先于英国的帝国游戏。英国防务计划开始改变,政府决定放弃大规模常规部队而追求廉价的核战略,现役军人从70万左右突然缩减到37.5万人。^[31]当英国政府的大国心态逐步调整时,我们可以深刻理解威尔逊政府1967年宣布撤出苏伊士以东防务的决定。虽然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认为英国政府

把假牙、免费的阿司匹林等国内杂事凌驾于世界角色之上是极其荒唐的^[32]，但他却从一个反面说明英国政府放弃了代价高昂的国际防务，把自己国内的民生问题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至此，英国放弃了霸主的心态。

对美国来说，支持或者反对殖民主义并无太大意义，怎样利用非殖民化为美国谋取利益才是最主要的问题，美国“帝国式”外交政策开始全面展开。^[33]在1957年国情咨文中，艾森豪威尔分析了中东新形势，要求国会授权总统实行“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计划”，每年向该地区提供两亿美元援助，并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34]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正式出台标志着美国正在中东替代英国早先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以反共产主义为名，更加积极地卷入中东事务。此后不久，美国增加对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援助。美国第六舰队进入地中海支持曾是英国坚定盟友的约旦国王，并向其提供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1958年，美国派出15000名海军陆战队抵达黎巴嫩支持亲美的加米拉·夏蒙总统。美国代理人帝国取代英国的殖民帝国，中东地区的霸权交接基本完成。

四、结论

在对霸权转移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都特别重视经济维度，然而，在特定的环境下，心态因素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霸权转移不仅仅是实力决定的客观过程，它还是心态影响的主观过程。二战之后，英国试图超越冷战格局并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势力，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是其大国心态的试金石，信心满满是英国大国心态的典型特征。但是，英国的战略不仅面临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也受到新兴霸主美国的挤压，英国则试图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主导性，宣示自己在中东的霸权。在与民族主义者决裂后，英国试图绕过美国，用孤注一掷的战争方式宣示英国的霸权，非生既死的冒险性成为英国大国心态的新表现。冒险的结果是苏伊士运河事件的惨败。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结果证明，在这个新时代，不是英国，而是美国才具有决定权。能够认清这一点，并且顺应这种局面，英国就可以更好地实现国家利益，否则，英国的霸主面纱终将被揭开。在痛苦的经历后，英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承认自己在英美关系中的小伙伴地位，放弃了与自己国际地位不相称的霸主义务。随着大国心态的调整，传统霸主与新兴霸主在中东地区的权力交接基本完成。

注释：

- ① 国内外学界关于英国衰落的研究已经成果颇丰，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学者认为英国衰落几乎等同于英国经济衰落。英国病成为英国衰落的重要体现，参阅罗志如，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实际上，英国经济衰落只是相对于他国而言，英国经济并不是绝对下降，关于这一点，参阅姚爱雨，陈祖洲：《英美学者关于英国衰落问题的研究》[J]，世界历史，2002(4)：105-110。
- ② 关于英帝国之后的美帝国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有 W. 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W. A. Williams. *The Roots of the Modern American Empir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其中，威廉斯及其学生关于美帝国主义的研究几乎重塑了美国外交政策史。

参考文献：

- [1] 杨永锋. 试析《租借法案》在英美经济霸权转移中的作用[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3): 266-272.
- [2]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 [3]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 [4] P J Cain, A G Hopkins. *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 1914—1990*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3: 270.
- [5] W R Louis. *The dissolu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C]// J M Brown, W R Loui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I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31.
- [6] Ritchie Owendale. *British defence policy since 1945* [Z].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
- [7] Ronald Hyam. *The labor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45-1951* (Vol. I) [Z]. London: HMSO, 1992: xxiii.
- [8] John Kent. *Egypt and the defence of the Middle East* (Vol. I) [Z].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8.
- [9] John Darwin. *Britain and the decoloniz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8: 112.
- [10] W R Louis. *Imperialism at ba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41—1945*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556.
- [11] H J Morgenthau.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s africa* [C]// C W Stillman. *Africa in the Modern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 [12] Steven Metz. *American attitudes toward decolonization in Africa* [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84(3): 515-533.
- [13] George C. McGhee. *Africa's role in the free world today* [J]. *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 1951(July): 97-101.
- [14] 吴秉真，高晋元. 非洲民族独立简史[M]. 北京：世界知识出

- 版社, 1993.
- [15] 唐同明, 向群. 埃及一九五二年七月革命和“自由军官组织”[C]//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 非洲史论文集. 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526.
- [16] W R Louis.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M].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2006: 609.
- [17] John Kent. Egypt and the defence of the Middle East (Vol. II) [Z]. London: The Stationery Office, 1998: 354–355.
- [18] David Goldsworthy.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 (Vol. I) [Z]. London: HMSO, 1994.
- [19] P H Nitz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frica: an American view [C]// C G Haines. Africa toda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5: 475–479.
- [20] Chester Bowles. Africa's challenge to America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133.
- [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IX, Part. II) [Z].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 [2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54, Vol. IX, Part. I) [Z].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6: 384.
- [23] Selwyn Lloyd. Suez 1956 [M]. New York: Mayflower Books, 1978: 34.
- [2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XV) [Z].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104.
- [2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XVI) [Z].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0.
- [26] W R Louis, R E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decolonization [J].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994(3): 462–511.
- [27] Elizabeth Monroe. Britain's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 1914–1971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209.
- [2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XXVII) [Z].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398.
- [29] 陈启能. 大英帝国从殖民地撤退前后[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7: 97.
- [30] R F Holland. The imperial factor in British Strategies from Attlee to Macmillan, 1945–63 [C]// R F Holland, G Rizvi.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London: Frank Cass, 1984.
- [31] 布莱恩·拉平. 帝国斜阳[M]. 钱乘旦, 计秋枫, 陈仲丹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410.
- [3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68, Vol. XII) [Z].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608.
- [33] Rupert Emerson. From empire to nation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
- [34]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57[Z].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784–790.

Adjustment of the power mind in hegemonic transfer: Taking the power transfer between UK and US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WWII for example

LIU Mingzhou

(Department of Polit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the trend of the hegemonic transfer can be determined by economic capacity, official mind under the special contex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After WWII, ensuring UK's world position by containing Soviet Union was Whitehall's important policy. British government was determined to maintain its exclusive hegemonic 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being filled with confidence was the typical feature of British official mind.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nationalists' challenge and the strategy of the US, UK tried to prove its hegemony by showing its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area, and anxiety without confidence was UK's new feature. When breaking with nationalists, UK tried to show its hegemony by risking everything on a single venture, and gambling became the new characteristic. When the adventure failed, UK recognized the priority of the Cold War of the US, and the hegemonic transfer in the Middle East was basically completed. British adjustment in official mind reveals that hegemonic transfer is also a kind of subjective process in which official mind changes.

Key Words: UK; great power mentality; hegemonic transfer; the Middle East; USA; Suez canal crisis

[编辑: 颜关明]